



願如是·心相續 驪歌初唱 珍重再見

◎陳惠秋

六月畢業熱潮中，本校107學年畢業典禮6月15日於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行。與會貴賓與學生家長及全校師生，透過「三寶歌」共同唱出對佛、法、僧三寶恭謹之心，揭開典禮帷幕。蒞臨的貴賓有本校莊南田董事，以及遠到而來的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校長和教授們。校長惠敏法師致詞表示：秉持創辦人聖嚴師父對大學院教育的期許，勉勵同學要學習做一顆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成為社會善良動能的發光體。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則以「和敬生才」為主題，期許畢業生廣結善緣成就「世財」，修習佛法散播「法財」，互助共修成為「人才」。

在莊嚴的菩薩行音樂歌聲中，佛教學系七位碩士班及十二位學士班畢業生以搭菩薩衣、傳燈發願大悲心起，完成隆重的授證儀式。人文社會學群四學程今年則有近三十位畢業生，由學群長陳定銘老師主持撥穗和授證。本屆共有六位同學代表上台分享畢業感言及致謝詞，表達對師長們



▲ 佛教學系碩士班與學士班之授證儀式。

諄諄教誨的感恩心，以及僧團與全校工作人員們的照顧與關懷。韓國道禪法師特別介紹其父親和哥哥也都是出家僧人，遠從韓國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法師分享在法鼓學習的這段回憶且將銘記在心。而人文社會學群之生命教育、社區再造、社會企業、環境

與發展四個學程的同學也依序上台，分享他們不可思議的來校因緣，以及師生彼此間交流的點滴美好。

典禮最後由惠敏校長與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校長共同簽署，完成雙方學術交流協議。此外，今年畢聯會與校友會共同精心籌畫的各項單元

活動包括：6月12日楊郁文老師和藍吉富老師的榮退感恩音樂會、午餐饗宴及校園導覽、咖啡、茶禪等系列節目，並且特別製作與今年主題相應的畢業歌《願如是》MV，帶給大家無限法喜與彼此感恩的美好時光。

春風化雨 弘法利世 楊郁文、藍吉富兩師榮退歡送

◎張巧昀／陳惠秋

由畢聯會主辦的感恩音樂會暨楊郁文、藍吉富兩位老師榮退歡送會，6月12日下午於大慧館與全校師生一起用感恩的心聆聽音樂，享受溫暖的午后時光。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亦特地前來向兩位老師表達最崇高的感謝之意。

楊郁文老師

楊郁文老師在法鼓體系教授《阿



▲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右）為楊郁文老師（左）致贈紀念品。

含經》長達36年，今年83歲。三十餘年致力佛法的研究與講授工作之外，更以二十年的時間獨力編纂完成三萬多詞條，650多萬字的《中華阿含辭典》。現今決定退休，準備專心完成該辭典。楊老師不僅是一位專業的佛學研究者，更是將佛學活用的生活實踐者。若具體呈現《阿含經》對楊老師在生活、修行上最深刻的影響，即是時常反省，待人處事難免有缺失，若發現須立刻修改補正，修行不外改過遷善，悉在生活中進行，學以致用、即學即用、佛學活用。楊老師期許法鼓學生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的成就勝過老師，這是投資佛法的最大獲利，可以盡未來際收益。而曾為學生的我們，要記得以佛法，與楊老師相遇，與法相遇，還報師恩。

藍吉富老師

藍吉富老師亦是一位把生命投入佛學研究的史學者。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早年專攻佛教史及日本佛教，近二十年來則專研大乘佛法。於



▲ 學生們歡送他們公認最帥的藍吉富老師（中）！

菩薩道之悲智雙運，於佛地之三身圓滿，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歷任佛光、玄奘等大學教席及現代佛教學會首任理事長等職。著有《隋代佛教史述論》、《中國佛教泛論》、《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佛教史料學》等書。編有《現代佛學大系》、《大藏經補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等書。

音樂會當天因藍老師仍須教課而無法出席，選修「世界佛教史」課程的

同學在6月17最後一堂課，邀請校長惠敏法師、簡淑華主祕以及藍老師曾經教導過的學生們，大家齊聚一堂為藍老師76歲大壽慶生與歡送。老師幽默、感性動人的致詞中，特別緬懷與感謝創辦人聖嚴師父當年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聘任與關照，延續至今與法鼓有著深厚的教學情誼。最後，恭請惠敏校長代表全體師生致上最虔敬的感謝和贈禮。依依不捨中同學們祝福藍老師，期待彼此與法再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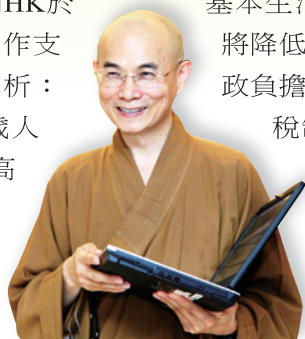
雙A時代的挑戰與雙B的因應

2013年，牛津大學發表《就業之未來：那些工作最易被電腦化？》報告指出：在未來20年內，美國有47%就業人口之工作是有超過7成機率被電腦化新興科技取代。

2016年，日本井上智洋博士說：「約在2030年，或許將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簡稱AGI）」，預測日本未來極端的狀況是「只有10%的人口工作的社會」，貧富差距更嚴峻，他認為可導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BI）

的社會制度來因應。

此外，對於高齡化（Aging）時代，2016年，英國出版《百歲人生：長壽時代的生活和工作》說明：2007年後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會活到100歲。2018年，日本NHK於「人生百歲的時代，工作支援政策為何？」議題解析：日本估計，2065年百歲人口將有54萬7千人。但高齡者如何維持生活與工作？參考北歐芬蘭的經驗，提出「全民基



本收入」（BI）的社會制度可能是解決方案。

所謂「全民基本收入」是由政府或團體無任何資格限制下每月發放給全員定額的金錢，以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反對者認為此制度將降低個人工作誘因，加重國家財政負擔。贊同者則認為可藉由調整稅制獲得財源；因為男女老少皆享有，可整合各種社會津貼福利，也節省防弊稽查之成本，降低「貧窮陷阱」，人們可從事自身喜

歡的工作。

敝人覺得：「雙B（BI基本收入+BL基本〔健康〕生活型態）」的因應會更有長遠效果。例如：推行「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與「終身學習五戒：閱讀、記錄、研參、發表、實行」之維持基本「體能、智能」生活型態（Basic Life styles），如此更可以減少個人與社會經濟負擔，提升全民的服務體能與智能，增進大家的生活品質與公民素養，這或許是建設「人間淨土」的基本方針。

DEDU(得度)對讀文獻編輯器新發表

◎劉小惠

佛學資訊與佛學文獻學跨領域合作的又一重砲巨獻——本校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歷時多年完成了電腦單機版的對讀文獻軟體開發之後，持續傾力研究製作——線上版的「DEDU對讀」，終於在2019年5月8日正式對外發表。

這項軟體的命名是從「對讀」的英文拼音「DEDU」的諧音而來，其中的意涵也令人玩味。開發的緣起是為了解決文獻研究者在使用一般文字編輯軟體所面臨的困難，尤其在編輯對讀文本時，常常因為一項修改，好不容易已經對齊的格式又全部跑掉、不得不全盤重整的窘境。而偏偏實際在進行佛教經典的學習

與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需要同時參考多個文本內容，以便於理解經典的真實含義。因此，將相關的幾個文獻妥善地編排在同一頁面來呈現其相互對應的特性，應該是在佛學研究、教學上一項相當常見的功課。有了「DEDU對讀」這項編輯利器，文獻研究者們也算是因此而「得度」了吧！

「DEDU對讀」除了能達到文本對齊、樹狀結構導引機制、加注、選擇性比對、多類型存檔模式的優異功能外，線上版更加碼挑戰「所有人都可以學會的對讀文本製作工具」，強調無需安裝，立刻上手，以最直觀的方式建立對讀文本，並且

更升級成為線上共享、共同協作編輯、即時討論的優化合作模式，將眾人的智慧結晶分享給全世界。其中，成果資料隨時可帶走，不受平台限制的設計，更是佛心來的。

在本次佛學資訊應用與佛學文獻研究的合作中，一個嶄新的方向出現了，傾聽需要、訂製適合使用的佛學研究工具，「DEDU對讀」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跨領域合作和資源共享讓未來學術研究的腳步更加穩健，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交出了一張亮眼的成績單！

想來「得度」一下嗎？歡迎您上網體驗！<https://dedu.dila.edu.tw/home/>

◎胡筱嵐

107學年心靈環保講座回顧

107學年的心靈環保講座已順利落幕，此次的講座專題演講由兩大主軸組構，由「心靈環保專論」始，後繼之以「心六倫」所結構的「高齡社會之在地照顧與社區關懷」系列專題演講，並由修習者進行分組討論，深入相關課題。全學期共計11次專題演講以及2次綜合討論，每次綜合討論各組均擔負報告與回饋之工作，強化學習成效。

本學年度心靈環保講座主題

為「高齡社會之在地照顧與社區關懷」，本次主持人為楊蓓老師，協同主持人為法鼓山方丈果暉法師與張志堯老師，而邀請來的講者皆是此領域重量級之專家學者。講者依序分別為楊蓓、許仁壽、黃榮村、薛承泰、楊文山、楊寧茵、陳麗光、黃勝堅、陳亮宇、詹火生和果器法師，從心靈環保與人間關懷、生活生命、當代教育到人口高齡化的討論和社會價值的照護，一直到臨終的死亡關懷。藉由著一系

列的演講課程，使學生更加瞭解高齡社會的照護與關懷。

而在小組綜合討論中，四組的主題分別為：論生死正能量——啟動生命之照護、心靈環保與高齡社會——以心靈環保在高齡教育上的應用為例、心靈環保與高齡者的自我肯定和心靈環保「品質老化」之理論、實踐與推動。各組的報告皆涵蓋與融入本次講座之主題，在報告過程中，內容詳盡且豐富多元。可見，學生在專題演講之受益良多與用心，進而成就此學年之心靈環保講座。本講座開辦至今已邁入第四年，從第一年的明心淨境，第二、三年的生態社區營造和鄉村社區營造，一直到第四年的高齡社會的照顧與關懷。每一年的主題皆以不同面向來探討心靈環保的議題，希冀同學藉由此課程瞭解心靈環保的定義且獲益匪淺。



▲ 佛光大學與本校師生共同展現十足的運動精神。

一期一會佛法盃以球會友

本校於5月1日舉辦第四屆佛法盃競賽，當天全校師生列隊揚生館球場門口，以最熱情開心的笑容，迎接佛光大學的蒞臨。開場在魄鼓社帶來振奮人心的鼓聲中揭開活動序幕。校長惠敏法師致詞表示：佛法盃的重要精神，在於藉由兩校彼此間的觀摩與球類運動，以落實創辦人聖嚴師父所提倡的「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業精進。」唯有健康的身體才能福慧雙修。佛光大學萬金川院長致詞則說：法鼓校園讓他每次來都有驚豔的感受，潺潺不息的流水溪聲宛如置身自然樂音中。同時，也特別介紹來自印度釋迦族的三位年輕同學，他們有感於佛教在印度的衰落，發心到台灣學習佛法，立即獲得在場大眾的掌聲與鼓勵。

上午的球類競賽有緊張刺激的男、女三對三籃球賽和羽球單、雙打、桌球雙打等項目，透過彼此相互切磋，各自都全力以赴，並展現十足的運動精神。中午稍事休息，享用豐富的午餐，法鼓山方丈果暉法師特別蒞臨致意與關懷，並提到：佛法盃自兩校輪流舉辦以來已邁入第四屆，非常難能可貴，期許未來還能有更多的亮點與突破。餐會結束後，本校安排數位典藏成果和DEDO文獻對讀軟體發表會分享，並參觀圖書館館藏與數位設備。

下午趣味競賽有拋大球、乒乓球拍競走、三分球射籃、躲避球四項。以遊戲的方式進行，透過隊友同心協力完成指定比賽，沒有競爭，只有快樂與分享的運動宗旨。最後頒贈「悲智」及「和敬」獎錦旗，並贈送同學製作的手工皂與佛光結緣，此次交流就在彼此感恩祝福聲中活動圓滿，期待明年再相會。

◎陳惠秋



▲ 107學年心靈環保講座期末結業。

學群
講座

美好的晚年 社區發展運用

◎莊璦淳

延續上學期「心靈環保講座」之主軸——高齡社會之在地照顧與社區關懷，人文社會學群邀請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主任葉玲玲教授，於4月15日蒞臨演講，以「高齡者全人健康與生活照顧——社區發展的運用」為題，惠敏校長、人文社會學群陳定銘學群長、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楊坤修主任與同學們皆到場聆聽。

葉玲玲教授先介紹自身背景，希望讓聽眾可以順其脈絡來了解自己如何思考這些議題，像是國家衛生政策、長照專業與實務經驗的培養等皆來自過往的工作經歷。葉教授從「人口老化是世界的趨勢」切

入主題，但要如何老的健康、快樂？居高不下的不健康存活年數、老年人口自殺率等皆是隱憂，接著向我們拋出「人什麼時候開始老？」之疑問，轉化我們對老的刻板想法，再引領我們從個人、家庭、社會的角度認識老化的衝擊，教授強調「沒辦法選擇不老化，但可以選擇有一個美好的晚年」，再向我們分享多面向因應老化的方法，個人可以了解老化、培養興趣與運動、有宗教信仰等，長照機構則需透過社區緊密連結、善用社區資源等。

緊接著舉出兩個社區照顧的實例，一個是經營者想照顧好自身的父親，另一個則是因建築師希望建築能與社區連結、

推動社區參與，兩者皆誤打誤撞進入長照但卻發展地十分創新多元，其中也提及其他長照中心失敗的例子，葉教授認為經營者是否用心想照顧好長者至為關鍵，最後教授以「認識社區的需要與資源，從共同需求開始，從照顧自己家人開始，擴展至鄰居、社區，及早開始共創美好未來」作總結，為未來的社區長照許下心願，更藉由同學的提問，期許未來

能開發精神層面的照顧以面對臨終議題。

葉玲玲教授十分幽默風趣，於話題間穿插各式生活化的實例，這次講座可說是上學期一系列課程講座的濃縮版，讓我們對此主題再一次進行統整、溫故並知新。

► 葉玲玲教授表示，我們沒辦法選擇不老化，但可以選擇有一個美好的晚年。



當印度成為生命中的幾分之幾

◎黃婉亭

「真假～妳要去印度當交換生yo」親友得知後，通常發出這樣驚訝的聲音。

緊接著，就會收到從光譜兩端發出的～無限的擔心或鼓勵。就如同佛滅百年後僧團的根本分裂，兩類族群有著大相逕庭的想法。

與煩惱心所相應者，通常滿面愁容，傾訴著他們的擔憂。人物例舉，媽媽：去印度好嗎？那裡很落後，怎不去先進的國家呢？妳的英文不好，去那可以嗎？學長K：妳完蛋了，接下來可能畢不了業喔。似乎去了

印度，是有可能永別了，抑或被玷污，抑或……，anyway反正就是任何的衰事都可能降臨身上。

幸好佛菩薩眷顧，交換學校的所在地浦那（Pune），相較於其他地方，是安全且乾淨的城市，這裡甚至被冠上了兩個美名，「印度牛津」和「瑜伽聖地」。

我所交換的浦那大學巴利語暨佛教研究系，除了教授巴利語外，也有梵文和佛教哲學的課程。考量英文程度不好，我沒有選修太多的課程。學校的Talat老師，知道我學習上有困難，還撥出時間輔導。初到巴利學院時，有種時光倒轉的錯覺，一切都很簡樸；此外，印度的學生非常尊敬老師，這特質在台灣已列入傳統美德了吧！

來到這裡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這隻「溫水青蛙」跳脫了原本的生活軌跡，開拓了視野，也看見了自己其實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在印度生活的不易與不便，外加無常特多，是個磨心性的試煉場。

感謝DILA交換生計畫的鄧偉仁老師及幼如菩薩，讓我的「印度夢」成真，還有喚起我「印度魂」的莊國彬老師；而我，能夠在印度安然生存，則是有支聯合國隊友在照顧著我，包括了：Prof. Deokar（巴利學院院長）、見故法師（台灣）、Chitra Tekawade（印度Home媽）、Kalsang Tashi（西藏）、羅小媽（中國）與劉時（中國）。

2018年8月底，我踏上了佛陀的故土，從此，印度，成為我生命中的幾分之幾。



▲ 筆者（左一）隨同浦那大學參訪位在telangana邦的著名佛教遺跡phanigiri，山腳下的村民友善純樸，還特地從家裡拿水出來奉茶。

學群
動態覺察與自由
莊子之樂

◎莊璦淳

本學年第三次人文社會學群教師學術交流，於5月1日歡喜地悠然的咖啡香中，由主講者蕭麗芬老師引領大家進入「覺察與自由——莊子之樂」的世界裡，並邀請人文社會學群長陳定銘老師擔任主持。蕭老師開場即分享自身在文理學院教學有份濃烈的感恩與享受，也期許自己與聽眾能一同享受在這一小時的學術交流中。

接著以為人熟知的「魚樂之辯」踏入正題，蕭老師認為莊子之樂可能來自兩點，一是莊子本身是快樂的，所以看到宇宙萬物的快樂，二是莊子具備感同身受、與萬物同體的能力。也就是這份看見與「覺察」，讓莊子對生命的存在有所體悟，認為人必須依循自身的本質與本心而活，因而發現天地萬物之根源——「道德」

（即老莊學說），最後則可到達精神提升後的「自由」境界，此三階段即為此次蕭老師分享莊子生命觀的梗概。

過程中穿插甲骨文圖像化的解說與生動的譬喻、實例，讓聽眾得以更貼近莊子的思想，像是蕭老師分享自己在孩子升國中時學到「信任孩子本身」，即體現莊子所說，對人天地萬物有充分的信任，只要順著自身的本性與本質發揮潛能，就能產生生命最好的樣態，實踐存在的意義；蕭老師也提到，人能否安然接受突然降臨的死亡，需要與自己內在有很深的契合，對自己所信仰的生命準則十分篤定，那份滿足與安頓和莊子內心的道對生命具有同樣效果。

尾段開放在場師長們跨領域交流，有環境與發展學程的張長義主任感到莊子思想與「環境倫理」的課程關係密切，若人能相信並順應自然，甚至體認到萬物與我為一的層次，對環境自會關心保護；社區再造學程李婷潔老師則提到，社會學家可能會認為人內在發揮的前提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所以關心社會制度的建構；最後生命教育學程郭文正老師亦分享，他認為莊子思想中有部分即是「去控制化」，道法自然是自然有其規律，而人對控制感的追求是來自生存焦慮，倘若能順應自然規律則能超越個人、制度等人為控制，達到更高的理想生命層次。



▲ 生命教育學程蕭麗芬老師與大家分享莊子之樂。

法鼓文理學院 志工招募 ～邀請您一起來護持心靈環保校園～

招募項目	作業內容	服務時間	
總機櫃檯	1. 教具、文具借領 2. 電話接聽、文書作業 3. 協助志工關懷作業 4. 諮詢服務	週一～週五 8:30～16:30	1天／週
校園景觀維護	1. 拔草、除草 2. 景觀區域維護 3. 景觀工具復歸	平日、假日皆可，歡迎個人、團體發心認養	1天／月

· 歡迎發心護持法鼓山大學院教育的菩薩，一起來打造「心靈環保的城堡」！

· 連絡方式：法鼓文理學院總務處 02-2498-0707#5012、5003；laybs@dila.edu.tw

My Research and Predetermined Relationship with Prof. Aming Tu

©Oleg Rinchinov (Head of the Center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stitute for Mongolian, Buddhist and Tibetan Studies, Siberia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re than 15 years ago, I met Professor Aming Tu. Over the years, he participa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reporting on the CBETA project and distributing compact discs with texts and program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t was somewhere in Russia or East Asia that we participated together in one session of a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Buddhist heritage. I remember how I was impressed with his presentation about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CBETA database for working with electronic Buddhist texts.

The Institute for Mongolian, Buddhist and Tibetan Studies, where I work, is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city of Ulan-Ude, in the Republic of Buryatia, one of the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Buryat people are a branch of the Mongols, with whom we share a comm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eritage. Like most of the Mongols, Buryats

traditionally profess Tibetan Buddhism. A network of monasteries was established in Buryatia, the technology of wood block printing was widely introduced. After the ruthless ev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our institute became a place of preservation of the vast Buddhist heritage in the Tibetan and Mongolian languages. The collections of our institute contain nine sets of the Kangyur, several sets of the Tengyur, and a huge amount of literature of other genres and categories. About 20 years ago, the electronic cataloging and description of this huge corpus of texts, and database development were started. Currently, more than 30 thousand books have been described, bu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em still require study.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efforts on the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heritage ar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motivation, methods and solutions for us.

My acquaintance with Prof. Aming Tu and his recommendations opened the way for me to Dharma Drum Mountain. My first visit was in 2009, when I met Marcus Bingenheimer and the IT team - Simon Wiles and Joey Hung. 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my one-month stay, I carefully studied the DDM experience in Buddhist heritage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study. I described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hat I found, including authority data, historical GIS, etc., in an article in the Russian journal *Bibliosphere* and started to apply them in my work. Even then, I



▲ Prof. Aming Tu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uddhism.

fully appreciated the high academic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of DDBC.

My current visit to Dharma Drum University of Liberal Arts wa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voted to historiograph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T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heritage of East and Inner Asia. DDM is a source of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this area, so I chose DILA as the base for my *bibliogra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 research. Thanks to the resources provided to me here, I completed my research plans enjoying the devotional and harmonious atmosphere of DDM.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Ven. President Huimin Bhikshu, Professor Teng Weijen, Doctor Joey Hung, and esteemed Miss Lu Youru, who made my visit possible and productive. And especially, I would like to commemorate Professor Aming Tu, who did so much for the prosperity of Buddhism in the modern world.



▲ Prof. Oleg Rinchinov (left) met with President Huimin (right) when he came to school.

DILA and Chan/Z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estern Buddhist

©Kami I Nowak (Ph.D. candidate at 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Kraków)

In this short essay, I would like to tell a story of my encounters with Chan/Zen Buddhism which eventually brought me to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ILA). Through this story, I will try to show the significance of DILA with reference to both: Chan/Zen studies and Chan/Zen practice.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Chan/Zen Buddhism took place in a Sōtō Zen center in the city of Katowice, Poland. During the visit, I received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sitting meditation and then sat in silence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After the sitting session was over, there was a time to ask a teacher some questions. Since I was a newcomer, I simply asked what I can attain by practicing sitting meditation. The teacher replied “nothing”. This was basically the whole teaching I received on that day. For the following few years, I practiced on my own and then rejoined other meditators. We practiced together for around seven years. In that time, I became truly fascinated with Chan rhetoric of direc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 related it to 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s I had pursued before, which made it sound like something real, like a true quest full of mystery and adventure. That sense of mystery made me think there wa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sitting and attaining “nothing”. That unstoppable will to understand, to learn, set me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teachers who claimed that doctrinal investigation was contrary to the ideals of Zen practice. Such a vision seemed to me somewhat extreme. It was all about radically simplified meditation technique and ineffable

experiences. After numerous un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eachers, I decided to leave the community and practice on my own again.

Dissatisfied with the teachers’ attitude, I decided to pursue Buddhist knowledge at the university. I quickly realized the existence of a gap between Chan/Zen practitioners and Buddhist scholars. Former ones usually just sit and do not engage too much in studying the doctrine; the latter ones are preoccupied with social, historical, linguistic,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forms of inquiry, often ignoring experiential dimension or explicitly diminishing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s. This academic, purely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han/Zen, was another extreme that I encountered.

Searching for a middle way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I learned more about early Chan as well as the figures who combined meditation (禪) with doctrinal (教) or textual (文字) studies, namely the figures such as Zongmi, Yanshou, Huihong, Jinul, and others. I also tried to find recent thinkers who combined Buddhist practice with extensive academic education. This eventually led me to the thinkers and teachers credited fo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haping modern Buddhism in Taiwan, namely Taixu, Yinshun, Xingyun, and Shengyan. This whole interest culminated in my journeys to Taiwan, which took plac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After visiting numerous places representing Buddhism in Taiwan, I ended up commencing visiting graduate student program at DILA.

I have been staying in DILA and the whole Dharma Drum Mountain World Center for Buddhist Education for around nine months. Based on my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I ca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is is a place wher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aforementioned extremes can be found. It can significantly enrich Chan/Zen practice as well as Chan/Zen studies via keeping facilities for Buddhist practice alongside places for academic endeavor. Thus, the practitioners will be constantly reminded of the vast knowledge creating the doctrinal context of Buddhist practice, and the scholars will be reminded that religious experience is an irreducible element of Chan/Zen.



▲ Meditation hall in DILA campus.